



美国学：学科成长与中国意义

作者：赵可金 发布时间：2010-09-27 22:21:55 已经被浏览1142次

【内容提要】美国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从20世纪初起步，迄今已经成长为一门涵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交叉学科，体现着美国文明独特的主体精神和价值追求。然而，美国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困惑，学界在学科定位、学术主题、研究方法论和学术社群等方面各执一词，鲜有共识。尤其是美国之外的美国学研究更是无法摆脱挫折感，美国学不过是向本国介绍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难以展开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对中国来说，突破现有美国学研究困境的一个途径是加强问题意识，淡化学科意识，加强比较方法，走中层理论的道路。

【关键词】美国学 问题意识 中层理论 中国意义

【作者简介】赵可金，男，1975年生，现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和中美关系研究。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胜因院27号，电话：010-62794307，13811607689，电子信箱：kejinzha@tsinghua.edu.cn

American Studies: Growth of the Discipline and Its Chinese Implications

Kejin Zhao

[Abstract] American Studies is one of young disciplines in Americ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 century, American Studies has become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with prominent character which contain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embodies American's special subject spirits and the concern of social values. However, there are even a lot of paradoxes and deep controversy, such as discipline positioning, research topics, methodologies and academic community, among scholar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tudies. In particular, the American studies abroa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definitely never been extricated themselves from feeling of frustration. And their tasks will not beyond the introducing American scholars' research products to mother country and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to push th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studies. For Chinese scholars, the effective way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present dilemma in American Studies is to weaken the sense of discipline, strengthen the comparative methodology and persist in the approach of middle range.

[Key Words] American Studies/Sense of Problem/Theory of Middle Range/ Chinese Implications

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自美国建国以来，在区区两百年时间内，后来居上一跃成为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发达国家，在几乎所有领域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关于美国成功的秘密早已引起包括美国学界在内的全世界学界的关注，从不同的学科、众多的领域和各个角度对美国展开全方位的研究，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有固定学术阵地和交流平台、确立了比较鲜明的研究主题、成功地实现向国外拓展”的新兴学科。^[1]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美国卷入世界程度的加深，来自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研究越来越成为美国学者和美国观点主导的美国学传统形成了挑战，所谓“重新世界化美国”（Re-worlding America）和“重新定位美国学”（Re-situation American Studies）的讨论日益热烈，美国学研究面临着凝练学科和重新定向的新课题。^[2]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鉴于美国学界的“美国学研究”与其他国家的“美国学研究”在范畴上存在着高度的不对称性，^[3]同时，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对世界未来的巨大影响力，此种情况合在一起，更加强了思索美国学学科发展方向及其对其他国家意义和影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在明确界定美国学的学科内涵和成长的基础上，对美国学发展面临的学术困境和未来思路进行分析，并思考美国学发展对中国美国研究的意义，以求教于方家。

美国学：学科与事业

一项成熟的学科必须矗立在一系列独特、精确、严格和科学的概念基础上，美国学也不例外。迄今为止，尽管学界有大量关于美国学的概念界定，但在指称对象、涵盖范围、关注议题和学科归属上尚无统一的看法，彼此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争论，这些争论已经严重影响着美国学学科的发展，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均是如此。^[4]归结学界关于美国学概念的界定，可以发现彼此之间的分歧是多重的、复杂的。

首先，关于美国学研究最为明晰的分歧是所谓“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和“对美国的研究”（the Study of America）的分歧。蔡翠红和倪世雄认为，美国学有不同的含义，美国学在本土的展开是一种面向自我、内向式的研究，它体现了强烈的美国性、民族身份诉求或者美国特质，是一个仍在不断拓展的多元领域，美国学是美国性和美国特质的寻找过程，是一内向的文化研究；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研究则集中于对一强大的他国的研究，较易倾向于政治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研究。^[5]在两位学者看来，美国的美国学研究更多是一种“美国研究”，比如美国研究协会（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执行主任斯蒂芬斯就认为，美国学是“旨在促进从宽广的人文意义上理解美国文化的过去与现在的一个独特的跨学科领域。^[6]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研究更多是一种“对美国的研究”，比如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教授认为，美国学亦即美国研究，是一门针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专门研究并探索其行为规律性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学科，从本质上来说，美国学是研究美国国家诞生、成长和发展的学问，从内容上来说，美国学是研究美国文明的学科。^[7]可见，美国的美国学研究和其他国家的美国学研究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它们在开展美国学研究的时候，可能并非强调同一个对象。

其次，即便是在“美国研究”内部，也存在对美国学的“整体主义研究”、对“美国的不同定义的研究”的区别。关于整体主义的研究，代表性的是美国研究的开山鼻祖帕灵顿，他在其被公认为美国研究奠基之作的《美国思想的流派》一书中说得明白：“我试图描述在美国文化中某些被认为是美国传统所特有的根本性观念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它们是怎样在这里诞生的、它们是怎样受到反对的、它们对决定我们特有的理想与制度的形式和范围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8]这一看法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比如亨利·史密斯（Henry Smith）的看法，他笼统地认为，美国学研究作为整体的“美国过去和现在的文化”，文化是“主观经历的组织方式”。^[9]在比如研究美国学运动的权威吉恩·怀斯（Gene Wise）认为，美国学是通过对美国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以揭示和论证美国精神的历史连贯性和社会一致性。^[10]罗伯特·斯皮勒直接认为，“寻求美国学单一方法的愿望源自于一

种要寻找出研究对象本身内在的有机一体性的愿望。”^[11]显然，在这些学者看来，美国学是一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学科。然而，20世纪中叶之后，对美国学的整体主义看法受到了一系列学者的批判，比如艾奥瓦大学的理查德·P·霍维茨（Richard P. Horwitz）则提出了一个更加广泛的界定，认为美国学的研究主题可以概括为各种群体对“美国的不同定义”，定义的内涵决定于历史发展和群体情感。^[12]归根结底是不同美国之间的争论。

另外，在具体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就更多复杂和多样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美国学更关注美国的国民性格、区域文化、思想传统等因素，在研究主题上更多关注美国的历史和文明，力图寻求对美国进行文学和历史结合的整体主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更突出人类学、历史学和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派瑞·米勒和F·O·马西森的研究是其突出代表。^[13]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学研究转而关注性别、种族、宗教、阶级等文化因素的研究，研究主题关注以社会意识为基础的美国思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比较方法、行为主义方法、批评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方法，阿伦·特拉奇滕伯格（Alan Trachtenberg）的阶级分析、戴维·R·罗迪格（David R. Roediger）的种族分析以及各种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等，都是集中的代表。^[14]如果具体到每个学者之间的研究，彼此的复杂和差异就更加多样了。

从美国学研究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出发，以研究美国学运动著名的四川外语学院张涛教授没有对美国学做出笼统的界定，而是从美国学构成的角度，指出了美国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他认为，“支撑美国学的基本构件有四个：一是美国学研究美国历史和现实中具有群体特色的集体和个人文化意识，这些意识汇聚成了美国的文化传统。二是美国学在实施这些研究时，经常以美国社会中某一群体的代表人物的代表著述或经历为切入点。三是在方法论上，美国学多以跨学科的方式出现，对传统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进行选择利用。四是美国学受时代氛围的影响较强，其发展因此呈现出从宏大叙述到细化研究的发展脉络。”^[15]但是，这一看法显然是过于看重美国学的复杂性，在强调美国学细节的同时，不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为此，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孙有中教授对美国学提出了一个较为宏观和明确的定义，他认为，美国学是一门探索“美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即‘美国的历程’的学问”，不仅涵盖了传统的美国历史研究，而且包括对美国当代社会与文化现象的考察。^[16]孙有中教授的看法非常清晰简洁，突出了“文化”、“历史”、“现状”的多重向度，既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学科关照，也具有开放的分析向度，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对美国学比较不错的界定。此种界定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突出美国学的美国性，将美国学沦为一般意义上的“美国研究”，没有揭示出美国学作为交叉学科的基础地位和美国学学科所内在着的理想和激情，不利于学界把握美国学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学科动力和源头活水，也不利于揭示美国之所以迅猛发展的精神支持和学科根源。

美国学既是关于美国的一门学科，更是关于美国的一项事业，其学科性和实践性是高度结合在一起的。从学科性上来说，凡是与美国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算作是美国学的内容，比如严维明先生认为，“美国学，或称美国研究，是一门把美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凡研究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外交，以及一切与美国有关的课题，均属美国学。”^[17]从实践性上来说，美国学也是美国人实现其理想和事业探索历程的学问，反映着美国与众不同的价值选择和理想追求。在斯蒂芬斯看来，美国学的研究目的在于“理解我们自己”。在马西森看来，美国的文学是“民主的文学”。^[18]在亨利·N·史密斯、利奥·马克斯等人看来，美国学就是一系列美国人的“神话”和“象征”。^[19]詹姆斯·西瑟认为，美国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应从支持自由民主政体的活动。”^[20]可见，在界定美国学的时候，既不能弱化其学科性的一面，也不能忽视其事业性的一面，必须兼顾两者，才能把握美国学研究的全貌。

如果从兼顾学科性和事业性的双重考量出发，美国学归根到底都是对美国民族特性、国家特征和社会理想的探索历程。从纵向的历史事业来说，美国学是来自全世界的移民先是在北美大陆随后是在世界范围内探索实现美国理想的历程，是一批批美国人获得自我精神和自我发展的经验结晶。迄今为止，这一探索历程包括三个阶段：一是美国从欧洲大陆的强权和母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山巅之城”，并实现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二是美国克服了从乡村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通过南北战争、进步主义、罗斯福新政等一系列改革，构建了一个新美国，实现了民主化和社会和谐；三是美国当下正在探索的如何适应全球化的挑战，努力解决美国和世界的矛盾，塑造一个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这一任务尚未完成，仍然处于探索过程之中。从横向的学科构成来说，美国学涵盖了三个领域：一是对美国人的研究，集中于民族特性及其价值的研究，力图回答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怎样摇身一变成为美国人的问题；二是美国国家研究，关注国家特征及其过程的研究，着力回答美国人所缔造的国家是如何可能的、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以及怎样才能为其他的旧大陆创造可以效仿的国家样板等问题。三是美国社会研究，尤其关注理想和秩序的研究，努力寻求化解社会冲突和实现美国理想的济世良方。无论隶属哪一个学科，只要力图推进美国学的研究，都会围绕上述内容从各自的视角展开研究，最终会殊途同归，汇入美国学研究的汪洋大海。

美国学：历史与范式

美国学是学科分化之后为满足美国民族精神需求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反动。尽管美国研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37年爱默生向哈佛知识界发表的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在演讲中，爱默生号召美国学者摆脱欧洲文化传统的束缚，创建具有美国本土特色的美国文化。但是，系统的美国学在20世纪之前却始终没有形成，甚至连“美国学”一词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美国英语中都很难看到。^[21]学界公认美国学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对形式主义的反动（The Revolt Against Formalism），最能够称得上是“美国学的思想之父”的是弗农·路易斯·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在1927年出版的《美国政治思想的主要流派》一书中，帕灵顿将美国文化的整合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从而将爱默生的“美国学者”变成了现实，作为一门独特学问的美国学确立了思想基础。^[22]随后，1931年耶鲁大学开设“美国思想与文明”课程，1933年该校授予第一个美国文明史方向博士学位，标志着美国研究的诞生。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全美国多达261个系/专业开设美国研究课程，研究方向涉及文学、艺术、历史等人文学科和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学等社会学科。^[23]

回顾美国学学科成长的历程，按照美国学事业的纵向线索和美国学学科的横向指标为依据，可以将美国学的学科成长划分为三个阶段^[24]：第一阶段是帕灵顿、马西森和米勒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新教运动范式，主要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第二阶段是亨利·史密斯、刘易斯和马克斯等人所代表的神话-象征范式，主要是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第三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后以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范式。

第一阶段是美国学的奠基时期：帕灵顿范式

美国最初起源于欧洲在北美的移民垦殖殖民地，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上带有极强的欧洲色彩，毋宁说美国学的开拓最初就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在北美大陆的延伸。受欧洲大陆哲学和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从殖民地开拓一直到19世纪末的200多年时间内，美国一直延续着欧洲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在学术上饱受形式主义（formalism）的制约，决定了美国学界长期保持着欧洲学术的风格。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美国的学术无法摆脱来自欧洲的影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新教群体（WASP）主导者美国的思想 and 学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学的起源本身就是一场通过批判欧洲思想传统而追求民族主义倾向的学术运动，也是美国学界对欧洲学科隔离传统反叛精神的结果。^[25]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实现政治独立的美国，在思想领域一直在谋求精神独立，寻求美国学的主观努力一直没有放弃过。尽管第一次宗教大觉醒运动为美国独立战争解决了合法性问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阿列克谢·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等思想家的著作作为美国政治缔造了新的基础，但是美国在人文思想和社会科学领域并没有摆脱欧洲学术传统的轨道，仍然保持着欧洲自由主义人

文和社会科学的总体特征，完整意义上的美国学并没有生根发芽。之所以缔造美国学的强烈动机无法开花结果，主要原因在于欧洲的自由主义在新大陆仍然一帆风顺，没有遭遇大的挑战和危机，美国学的学科成长仍然缺乏客观基础。

美国学发展的客观基础来自于19世纪中后期北美工业化的浪潮。西进运动后，美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来自中东欧移民浪潮的兴起，打破了乡村社会的节奏，无论是物质生活领域还是精神生活领域，都引发了一场革命。从物质生活领域来说，经济领域中的垄断、生产领域的产品质量问题、城市生活中的失业和流浪以及政府中肆虐的腐败，习惯于自足、平等的乡村农业社会的人们无法适应以分工和依赖为特征的城市工业社会，在客观上令自由主义陷入心理错位和价值危机，进一步引发了一场进步主义运动。从精神生活领域来说，人文学科研究主题的非美国化、高校的地方主义倾向、学科隔离以及学科过于精细带来的弊端引发了一场旨在增进学科融合、全方位研究美国特定的美国学运动。^[26]以詹姆斯·哈维·鲁滨逊为代表开创的新史学改变了美国历史学以政治史和精英人物传记为主的研究传统，开辟了将思想意识与历史结合起来的新史学道路，与文学领域“对形式主义反抗”的反叛者合在一起，产生了最初的美利坚民族。在19世纪中后期，弗农·路易斯·帕灵顿在《美国思想的主要流派》、F·O·马西森在《美国的文艺复兴》和派瑞·米勒所创立的以美国式自由主义思想与新教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帕灵顿范式”成为美国学诞生的标志。

面对工业化时代对自由主义传统的威胁，无论是帕灵顿的思想史模式，还是马西森的文学模式，还是米勒的清教模式，都强调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改造。帕灵顿以法国浪漫主义思想为依托，在不否定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强调社会公正、权力分散和农业至上等自由主义内容，对杰弗逊的思想充满崇敬。^[28]相比帕灵顿关注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马西森更关注知识精英在自由主义遭受挫折时的内心世界，更注重人格完整的境界，追求社会公正、怀念农业生活模式、主张政治民主是马西森笔下美国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29]不难看出，尽管两人思想不仅相同，但追求民主、公正的自由主义是其共同的理想，这是一种农耕文化的价值观。这一对人性、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呼唤有助于此后美国国家自由主义的成长，政府对自由的干预越来越成为美国自由主义的内容。米勒对清教的研究将美国学推进到美国人的精神世界，认为清教在美国历史进程中其本来特性逐步消失，最终完全融入美国世俗历史进程之中，源自欧洲的一派宗教思想转变成美利坚民族的自由、民主、宪政信念，世俗化后的清教开始主张社会公正、民众权利和北美的特殊性，清教从一场欧洲宗教运动转变成北美的思想运动、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和外交运动。^[30]尽管早期美国研究的思想家们彼此看法存在些许差异，但基本上在美国历程的本质和研究方法论上取得了若干共识，被称之为“帕灵顿范式”，吉恩·怀斯将其归结为五方面的内容：（1）美国存在单一的“美国心灵”；（2）“美国心灵”扎根于新世界，以满怀希望、充满纯真、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理想主义为主要特征与欧洲大陆区别开来；（3）美国心灵存在于每一个美国人身上，也集中体现于美国主要思想家的论著中；（4）美国心灵是美国思想史永恒的主题，涵盖了新教主义、个人主义、进步主义、实用主义、跨越传统主义等内容；（5）美国学推崇美国的高雅文化和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31]这些假设作为美国学研究的基本路径，成为学界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共享的范式。在方法论上，早期的美国学研究看重历史和文学的结合，看重思想史研究，认为只有从思想反思和自我剖析中寻找美国特性和民族意识的根源。帕灵顿范式解决了“美国为什么与众不同？”的问题，但并没有回答“美国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尤其是缺乏能够涵盖人、国家和社会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仅仅从思想史、文学和宗教领域确定了边界，至于边界内的美国内涵还没有做出回答，这一任务留给了美国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美国学的成熟时期：神话-象征范式

从进步主义到罗斯福新政，美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基本解决了从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而产生的心理错位问题，但美国在文化心理仍然十分不安，南北战争导致的文化记忆阴影始终萦绕不散。特别是二战后大量欧洲中东部移民涌入美国，建立了大片的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移民区，加之种族、妇女、移民等多元意识的崛起，关于“我们是谁？”的身份困惑日益成为美国学面临的主要矛盾。“界定美国性格、找出南北文化的共性便成了五六十年代美国研究的首要任务。”^[32]为此，以亨利·N·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R·W·B·刘易斯（R. W. B. Lewis）、利奥·马克思（Leo Marx）和阿伦·特拉奇伯格（A. O. Rabinowitz）、查尔斯·菲德尔森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确立了“神话-象征”范式，从不同角度探讨美国心灵与美国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以寻求美国学的独特身份特征。“神话-象征”范式认为，在美国文化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存在着某种能够凝聚美国社会意识并能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根本特质，这些特质就是在美国文化史上反复出现的某些“神话”（myth）、“象征”（symbol）与“母题”（motif）。^[33]通过这些神话、象征和母题，美国学将美国心灵与多彩的现实历史进程链接起来，构成了美国人独特的经历和身份认同的载体。

对美国进行“神话-象征”范式研究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特纳（Frederick J. Turner）在1893年提出的边疆学说。特纳目睹了美国边疆开发的历程，对边疆和美国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有独特的感悟，在1893年发表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以及几十年发表的《区域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等文章中，特纳坚持认为边疆开放塑造了美国的特性，自由、民主、平等、个人主义等美国精神产生于西部边疆开发过程中，而非源自欧洲，美国文明绝不是欧洲模式在美洲的翻版。^[34]特纳的边疆学说将美国学文化意识的主导权争论纳入学术话语体系，开辟了美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而非移植而来的美国的学术方向，从农耕生活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和富足升华为社会理想，确立了一个美国的边疆神话。

特纳从美国历史中提炼学术范畴的做法，在20世纪50年代引发了一批学者的关注。亨利·N·史密斯沿着特纳关于西部边疆开发的历史，考察以政治家和冒险家为主体的拓荒者探险历程，在1950年出版了《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史密斯发现，在美国向西推进的历史中，逐步确立了“帝国神话”（Myth of the Empire）和“花园神话”（Myth of the Garden）。所谓帝国神话，是指美国政治家和探险家在“天赐使命”的激励下，向西推进的大陆扩张，“穿过阿勒格尼山脉的隘口，跨越密西西比河流域，翻越远西部的高山平地和崇山峻岭，最终达到太平洋海岸。”将新的土地纳入美国的版图，不断扩张帝国范围的过程。所谓花园神话，是指美国拓荒者对占领的西部土地进行开垦，建成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世界花园，“他们在处女地上握把扶犁，播种庄家，辽阔的内陆河谷变成一座花园；想象中的世界花园。”^[35]在史密斯笔下，帝国神话的政治扩张和花园神话的农业开发是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在一起，完全是美国西进运动时已经远去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群体记忆，此种记忆是惟有美国才有的经历，不可能是欧洲的产物。

与史密斯追寻远去的群体记忆不同，刘易斯关注的是对欧洲旧传统的批判和对美国新传统的培育。刘易斯在1955年出版的《美国的亚当：19世纪的纯真、悲剧与传统》一书中，针对美国“新英格兰和大西洋沿岸”的东部地区19世纪初期兴起的乐观主义文化情绪，刘易斯从文学领域中的希望派、记忆派和反语派争论中发现美国人有一种返璞归真的“亚当理想”，这一理想激励美国人敢于摒弃欧洲传统，缔造“新伊甸园”的美国传统，做创造新传统的“美国亚当”，这是一位“新冒险英雄”，“一位已经从历史中解放出来、愉快地摆脱了祖辈束缚，未被通常的家族和种族所触及和腐蚀的人；一位孑然一身、自立自强、时刻准备用自身的独特力量面对一切挑战的人。”^[36]这一理想是东部人集体辩论形成的“本土神话”。刘易斯的“美国亚当”神话仍然是以美国本土的生活方式和制度为支柱的，赋予美国一种崭新的身份认同和形象标识，但由于刘易斯更多着眼于文学领域，至于美国社会领域中是否认同这一神话，仍然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史密斯的学生里奥·马克思在1967年出版的《花园里的机器》一书中进一步考察了美国西部代表的田园理想（Pastoral Ideal）与东部机器大工业代表的现代社会之间发生的持续不断的冲突，机械时代打破了“绿树环绕的隐居之地”的宁静，田园理想所极力恢复的是农耕生活中那种简朴、和谐和贴近自然的生活，充满对“曾经未被玷污的绿色共和国形象以及林木环绕、村落散布、阡陌纵横并致力于追求幸福的宁静之所的怀念。”^[37]在马克思看来，美国特殊的自然环境形成的田园理想和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一起，构成了美国区别于欧洲的最突出特征，使得田园理想对美国人特别具有吸引力。面对欧洲传入的机器大工业、工厂制度和城市社会，几乎“从杰斐逊时代开始，美国理想的根本实现形式就是乡村景观，即被修整得井井有条并将扩展到整个大陆的绿色花园。”^[38]不难看出，对农业以及散居的生活方式的憧憬升华为美利坚民族的神话，也构成了美国身份认同的最基础

象征。

尽管史密斯、刘易斯和马克斯等在关注重点和具体观点上存在差异，但他们共享神话-象征范式，都是对美国特殊经历的提炼和整理，也都坚持农业主义和工业主义冲突的辩证思维视角，都倾向于认定美国理想的本质在于回归自然和乡土生活方式，在研究方法上都不同程度地坚持以“原则性的机会主义”为美国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广泛借鉴包括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39]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学已经步入成熟阶段，学科范式和研究社群已经趋于重合。当然，神话-象征范式也存在深刻缺陷，这一过分偏重学科基础的范式，反而相对忽略了作为美国事业的历史和社会多样性维度，忽视了美国种族、性别、阶级等多样性社会因素的研究，更多从人文学科中汲取营养而忽视从社会学科中吸纳资源，将美国学引入了一个相对狭隘的研究领域。随着20世纪60年代多元群体意识的觉醒，这一范式的美国学越来越无法适应现实的要求和挑战。

第三阶段是美国学的反思时期：后现代-文化批判范式

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所致力力的“美国例外论”受到了来自各个领域的挑战，各种形式的政治反叛、大学里的民众抗争、城市骚乱、反越战运动升级、反文化潮流等，犹如将美国带入了一个批判一切的文化颠覆阶段。受现实社会领域和欧洲思想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想的冲击，美国学进入了自我反思的时期。在这一反思时期，美国学步入了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轨道，注入黑人研究、通俗文化研究、民俗研究、妇女研究、生态研究、电影研究、种族研究、物质文化研究、教育研究、青年研究、第三世界研究以及美国土著研究等纷纷进入美国学研究的视野，美国学呈现出一系列不同以往的特征：“重视文化的人类学定义，注重社会结构、自我反省、多元化趋势，注重对个别现象的研究，关注文化经历的覆盖面而非本质。”^[40]在此种反思过程中，美国已经很难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进行研究，精英研究和经典作品研究已经不能作为透视美国的有效窗口，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内容被纳入文化研究的范围，以阶级、种族和性别为主要内容的所谓亚文化研究（sub-cultural studies）迅速扩散，美国研究面临着“碎片化”的问题，研究者的主观阐释动机和自我反思成为美国学关注的重心。^[41]

受欧洲新马克思主义和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影响，阶级分析成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只不过美国学的阶级分析不再把阶级看作是经济决定的产物，二是以社会经历和文化意识划分阶级，以阶级分化考察美国文化。在这方面为学界公认的代表作是阿伦·特拉斯滕伯格的《美国的公司化》和戴维·R·罗迪格的《白人的身份工资：种族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特拉斯滕伯格看来，不同阶级和社会阶层对美国的认识是相互冲突的，此种冲突更多在文化层面展开，关于美国本身的意义是争论的焦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拥有新的等级控制机制、与过去不同而结构更加紧凑的社会”，其中，社会中上层在决定美国的内涵中处于主导地位，被动接受者则构成了反抗力量，劳资冲突从根本上是一种文化冲突。^[42]相比特拉斯滕伯格聚焦于阶级的文化分析，罗迪格则将种族、阶级和话语权的分析融合到了一起，考察了美国工人阶级内部种族主义的发展，认为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标志是在文化意识中对有色种族部分程度上的容忍，而白人工人的种族排斥情绪是贯穿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线索。^[43]将社会关系、阶级和文化意识结合在一起，是新马克思主义对美国学的一个贡献，令人看到美国例外论背后复杂的内容。